



「韩」郑世朗著 赵杨译
《孝尽》 中信出版集团

“能指”的天赋

□张怡微

我读到小说集《孝尽》时，隐隐觉得郑世朗应该是个很有趣的人。这种有趣之处，在于一般而言，只有年轻作者（用力将处女作展现自己才华的方方面面的作者）才会需要这样一本小说集。然而郑世朗已经成名，出版了6部长篇，她曾被归类成各种各样的作家，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孝尽》中的小说风格每一篇都不一样，不是故事不一样，而是连涉足的文学类型都不一样，情感的气息也不一样。正因多变的风格，实验的特点，《孝尽》很难被提炼出一个统一的话题。出版社将整本书包装成和中国“招娣”这个名字所涵盖的女性话题，实在太过苦闷，也会过滤掉那些对女性小说不感兴趣的读者。可是只要打开《孝尽》读完三分之一，就知道我们被营销“欺骗”了。

尽管《婚纱44》《屋顶见》中可以看到郑世朗对婚姻的嘲讽态度，但她只是嘲讽婚姻本身，她透过婚姻看到了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女人，这些女人“什么时候都有想逃避的东西”，甚至逃避的对象都不固定，结婚只是这空茫的生命焦虑中较为具体的对象。一件婚纱经历了44个女人的身体，44个人因为各种原因必须穿上它，直至这件婚纱终于被一杯打翻的咖啡给报废了，报废前还被廉价地使用过一次。“婚纱”，成为偷窥女性身体和生活的媒介，像一代又一代传承之后濒临报废的生活模式。你可以说这种模式是婚姻，也可能是一种陈旧的女性生活习俗。作家看到了也有女人因此感到挺快乐，对于这些庇护是心向往之的。虽然大部分女人对此类习俗只是感到麻木。实际上郑世朗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大都已经在社会场域上或喜或悲地活动着，有的甚至还是家族生活的顶梁柱，是自食其力的典范。这样的女人，再回过头看古代女性的生活情貌，并没有侥幸和控诉，反而产生一种搞笑的奇幻感。《屋顶见》中，职业女性模仿古代女性的方式，通过一本叫作《闺中女子密书》的御夫之道，召唤出了一个带引号的“丈夫”。这个“丈夫”未必是一个真人，连外星人都不是，而是一个叫“丈夫”的怪物。“丈夫”来到了女主人公的夜间生活里，十分饥渴地要吸食妻子的“绝望”。郑世朗写道：“想来是这么回事，它第一次之所以够吃是因为吞下了我积攒一生的绝望，而一天的绝望连一袋粉剂的量都到了我，虽然够苦但分量太少了”。虽然女性小说中，对男性的吐槽不胜枚举，我还是被郑世朗的刻薄打动了。我觉得她已经绕过了生活表象的绝望，并开始玩弄绝望。在写破爱情这个领域，郑世朗好像确实发明出了一些新的东西。故事因循的原则不是现实的逻辑，而是生造出来的。趣味建立在“生造”之上。硬要概括的话，郑世朗的部分故事有点像上海作家沈大成小说里的怪异元素。她能看到生活变异的可能性，有如《奥丽芙·基特里奇》中，学生在车里看到Olive的头变成了大象。

郑世朗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她很容易在叙述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找到契机逃逸到另一个时空。我们当然可以将之视为“穿越”小说的一种，只是她还有别的目的。《众所周知，隐热》和《永远77码》都有具体的历史事件为依托，一是19世纪初朝鲜平安道农民反对李朝封建统治起义的“洪景来之乱”，一是1894年朝鲜半岛的甲午农民战争。乱世中幸存的隐热，后来成了一名女性海盗，也是被朝鲜王朝认为是“伤风败俗”之徒的革命精神继承者，除了一位女研究生在一篇失败的研究论文中关注她，没人记得她。同样隐身于历史背后的，还有经由甲午战神点化的女吸血鬼。郑世朗的情欲书写大都很有“志怪”味，女吸血鬼在男人带有辱骂的性活动中完成吸血反噬，使之变成柿饼一样的人干。这和《幸福饼干耳朵》中那位来自约旦的男性，在首尔遭遇意外后长出了饼干耳朵，总在亲热时被女友忍不住一口咬下，异曲同工。能敏锐地注意到历史迭代和饮食行为之间的关系，也许是作家从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中汲取的灵感，《伊玛与沙》中的大食国、小食国更往前一步，是语言学上“能指”的虚构。郑世朗也是有能力将“能指”的虚构潜力激发出独特美学的天赋者。

当然这些故事并不是没有缺点，因为太过奇情和荒谬，会让严肃的精神跋涉变得太轻巧。例如《宝妮》中的“猝死地图”，实际上“死在21世纪的人，最终都会变成数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梗，非常有“黑镜”科幻感，背后当然都会有高度内卷的社会问题和青年抑郁的问题。小说却写得像是一个韩剧的开头，既没有彻底调度起恐惧，也没有调度起悲凉，它就只是一个现实生活中混灭个性的开场，一个布景，它未必支撑得起一个故事的血肉。也许只有逃出现实世界的那个刹那，符号意义被触发，才是郑世朗的舒适区。



「日」石田衣良著 千日译
《池袋西口公园》 上海人民出版社

坏小孩也有春天

□陆远

对于新井一二三这样在东京市中心长大的作家来说，池袋“一贯是很土气的三流繁华区：没有银座的高贵、六本木的洋气、涩谷的时髦、新宿的次文化”。就连这里的标志性建筑，六十层高的阳光城大楼，也是盖在二战后关押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旧址上，总不免让人有阴森的联想。不过，最近一二十年，以池袋西口公园为中心的街区已成为各种东京导游手册上热门的打卡点——来自全世界的文学青年，总免不了要到人气作家石田衣良笔下的光怪陆离的神秘世界做一番“探险”。

《池袋西口公园》是石田衣良的处女作，这部短篇小说讲述了池袋西口水果店家的儿子、19岁的待业青年真岛诚与伙伴们做业余侦探的故事——为了找出杀害好友理香小姐的凶手，真岛诚化身东京街头的金田一，联合各种街头势力，最终解开谜团，告慰死者。1997年小说一经发表就在文坛引起广泛反响，当时已年近不惑的“中年新人”迅速成为备受瞩目的畅销作家。此后多年间，以真岛诚为核心人物，以池袋街区为核心地点，石田衣良陆续创作了十余部非典型推理小说，还被相继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和动漫作品，掀起长盛不衰的“IWGP”（池袋西口公园英文首字母缩写）文化旋风。

在日本，石田衣良被称作“叛逆青春的代言人”，他的笔下多为游离在朝九晚五安稳生活之外的“坏小孩”，几乎没有一个人拥有世俗意义上“健康、幸福”；真岛诚是一个没有学历、没有正经工作的街头混混，他的好友安藤崇是池袋少年黑帮的老大，两人共同为之报仇的理香则是靠援交过活的不良少女。表面上看，池袋西口公园永远处在阴影之下：家庭暴力、校园霸凌、神经失调、乱伦、吸毒、卖淫、非法劳工……每个人都颓废、堕落、追求极限刺激，每个人也都有过不可告人的悲惨经历、精神创伤。但“IWGP”系列作品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作者是以宽容、温暖的笔触刻画这些在世俗社会迷失坐标、病态乖僻的少年。在太阳光芒照射不到的角落，在秩序井然的“正常”社会之外，这些边缘小人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倔强地生活。作家说，“我不认为那些存在问题的人就不能重生。接触了社会的邪恶与黑暗边缘后重新站起来，树立新的人生目标，坚强地生活下去，我欣赏这样的人物，我认为这比循规蹈矩活着的人更有魅力。”

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为主流社会道德标准所不屑的小流氓真岛诚，每每遇到伙伴们或社区的危机，总能表现得既精明又勇敢，在危急时刻助人于水火，却从不端着“大义凛然”的架子。在那些大是大非的当口，几乎被“正义”的面目附身时，他也会提醒自己，“喂，为什么我会被选为裁判员，这些是非问题不是那么容易找出答案的”。这种冷峻的“即兴的正义感”是石田衣良的小说人物基本的价值底色，用真岛诚的话说：“我们的人生应该不是只有黑白两色才对。无论是一尘不染的无瑕纯白，还是毫无光泽的终极黑暗，你都应该没看过吧？我们每个人都是灰色的，从出生开始，就分到相同分量的光亮与黑暗。人活着不就是这样吗？”

日本小说家菊池宽曾经说：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作家为自己写的，后者则是为别人写的。石田衣良被定位为大众作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只是为了迎合市场需要，顺从大众口味，事实上，他对社会变迁有着不同于一般通俗作家的反思，并不妥协，也不浮于表面。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那一代的青年有许多对未来彷徨失措，看不到希望，这是池袋街区不良少年泛滥街头，荒唐消磨青春的社会背景。石田衣良本人也曾经经历自闭、失业种种人生挫折，对下行时代青年人的脆弱无助有切身的体会，也深知所谓人格缺陷与行为乖张的背后往往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能量。借小说中另外一个“坏小孩”京一之口，作家对这个看上去花团锦簇的社会提出控诉，“年轻人没有可以尊敬的对象，身旁又没有可以称作模范的大人，而且大人还剥夺了他们的梦想”。相反，正是在鱼龙混杂的街头，少年们获得温暖与慰藉，“在这里，有被他人需要的充实感，有被朋友欢迎的喜悦，也有他们所缺少的规律和训练，我们集众人之力一同去寻找现在社会上得不到的东西”。街头，是“坏孩子”们展现自我的舞台，更是一所严格的学校，他们“在那里争执、受伤、学习，获得一点点成长”。

尽管作家实际上从未在池袋西口周围居住过，也从未实际接触过街头的少年帮派（尽管他成名后吸引了不少混帮派的粉丝），小说的情节固然全凭想象，却抓住了青年亚文化最重要的核心：帮派盛行“地下社会”看似危险，却有它自己的秩序，而且可能更坚持它所信奉的价值。

崩人快语



「法丹」弗朗克著 马振骋译
《自由派作家们》 新星出版社

世界的十字路口

□蒯乐昊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巴黎，海明威笔下“流动盛宴”的中心，洗衣船、圆顶咖啡馆、丁香园来来往往当时世界最具才华的一群人：雅里、毕加索、阿波利奈尔、达利、米罗、桑德拉尔、莫迪利亚尼、苏丁、克洛岱尔、巴塔耶、布勒东、纪德、马尔罗、海明威……“每个人都带了自己的钢笔、画笔、目光，在这些烧焦的土地上创造杰作……巴黎不再是世界的首都，它变成了十字路口，世界各国的作家、诗人都经过这里，然后前往召唤他们的城市和国家。”

人文史上的高光时刻，究竟是这群人的个人魅力折射出的光芒照亮了时代，还是时代的聚光灯照亮了这群有幸抑或不幸处在历史转折点的人们？《自由派作家们》试图对这组群像进行描绘，不单单描摹出这些人，亦描绘出他们脚下的舞台。

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难以评价的复杂性，在1936年9月的某个夜晚，两个男人在巴黎胜利广场共进晚餐，长者67岁，刚刚从苏联归来，在那里他受到热烈欢迎和高规格的接待，完全符合他热衷长期作为社会事务的知识分子、国家良心的身份。年轻的那位35岁则刚从西班牙回来，他是共和国军队的上校，并一手建立和领导了航空纵队。

年长者就是安德烈·纪德，年轻者则是安德烈·马尔罗，这两位安德烈都同时承受着来自两极的评价，在一极被奉若神明，在另一极则臭名昭著。纪德的恶名是极端分子、通奸犯和同性恋，马尔罗的恶名是文物盗窃犯、叛节者和革命党。

这便是那一代文化枭雄的象征，他们分裂的名誉，恰恰来自一个分裂的时代，他们去往的莫斯科和马德里，在20世纪正在拐入一个新的岔道，所有在这个时代留下声名的人，无一不是在拿自己的声名冒险，文明价值观正在经历激烈的洗牌，而巴黎像是一个中转站和连接点。两个世界彼此碰撞，巴黎是终点，两个世界分道扬镳，巴黎又是起点。

纪德在法国知识界的地位至高无上，他那虎穴龙潭一般的寓所，也是精英不容绕开的聚会地，在法国能享有这一地位的，在他之前是巴雷斯，在他之后是萨特。彼时纪德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声名来自他的文章和编辑工作，他创建的新法兰西出版社（后来成为伽利玛出版社）蒸蒸日上，无疑是文艺界和思想界的领军者。

马尔罗在西班牙叛乱开始抵达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首府奔走，只希望做成一件事：支援受到攻击的共和国。原因无他，只因为一旦巴塞罗那陷落，法西斯分子开入加泰罗尼亚，前往法国的道路就会被切断，国际社会的援助体系便会受阻。这位作家明白，要切断叛乱部队的进军，一支装备充足的飞机纵队是不可或缺的，西班牙当时航空力量薄弱无比，只有两百架飞机和一百五十名飞行员，弹药不多，炸弹更少。年轻的安德烈手握电话不放，到处“摇人”：寻找飞机，寻找飞行员。他甚至利用太太克拉拉富庶的家庭背景，加上西班牙银行的黄金，自行买入几架飞机，招募西班牙航空纵队的首批飞行员。形形色色的志愿者和冒险家都来了，其中甚至不乏走私者和犯过重罪的囚犯。

这两位安德烈之间的分歧日渐明显：苏联。一个精彩、纷乱、令人惊心动魄的时代就在这样的叙述中拉开序幕，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时代，如果说，一战之前的世界，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投身社会公共事务，参加军队，是为了保卫法兰西，那么在二战前后，他们冲锋陷阵不再是仅仅拯救一个国家，所有人都意识到，第二次战争保卫的是一种世界观。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各国门口徘徊，令德国瘫痪，令西班牙遍地战火。而莫斯科，是堡垒，还是叛军？时代逼着人们站队，如分水岭分开时代的洪流。

当然，总有人哪一边都不站，比如极端自恋的萨尔瓦多·达利，“舆论的鬣狗在我四周狂吠，要我给自己定性：希特勒分子还是斯大林分子？不，说一百次也是不。我是达利分子，纯粹的达利分子。”这充满个人主义的声明，倒也是现代文明潮水的重要分支之一：自我。

要深刻理解二战之后世界的格局，也许得从理解上世纪前半叶的巴黎开始，当时处在世界十字路口的巴黎，正是现代主义一切理论、一切思想的熔炉和试炼场。

远见近拾

微言达义